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6

A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杨义 / 主编

# 二十世纪 中国翻译文学史

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

李宪瑜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杨义 / 主编

# 二十世纪 中国翻译文学史

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

李宪瑜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李宪瑜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306-5148-3

I. 二… II. 李… III. ①翻译—文学史—中国—20世纪  
②文学—作品—简介—英国③文学—作品—简介—法国  
④文学—作品—简介—美国 IV. I209.6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123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5 插页 3 字数 194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 目 录



<b>第一章 英国文学翻译</b> .....	001
第一节 概述 .....	001
第二节 莎士比亚翻译 .....	007
第三节 弥尔顿《失乐园》翻译 .....	017
第四节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翻译及其他 .....	023
第五节 简·奥斯丁翻译 .....	026
第六节 狄更斯翻译 .....	029
第七节 勃朗特姐妹及乔治·艾略特翻译 .....	032
第八节 哈代翻译 .....	038
第九节 王尔德翻译 .....	046
第十节 高尔斯华绥翻译 .....	051
第十一节 康拉德翻译 .....	053
第十二节 萧伯纳翻译 .....	059
第十三节 英国诗歌翻译 .....	066
<b>第二章 法国文学翻译</b> .....	079
第一节 概述 .....	079
第二节 莫里哀翻译 .....	085

第三节	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翻译 .....	089
第四节	巴尔扎克翻译 .....	092
第五节	司汤达翻译 .....	098
第六节	福楼拜翻译 .....	102
第七节	左拉翻译 .....	111
第八节	都德、莫泊桑翻译 .....	118
第九节	罗曼·罗兰翻译 .....	124
第十节	纪德翻译 .....	134
第十一节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翻译 .....	141

### 第三章 美国文学翻译 .....

第一节	概述 .....	150
第二节	爱伦·坡翻译 .....	159
第三节	霍桑翻译 .....	161
第四节	惠特曼翻译 .....	164
第五节	马克·吐温翻译 .....	168
第六节	杰克·伦敦翻译 .....	171
第七节	德莱塞翻译 .....	178
第八节	辛克莱翻译 .....	180
第九节	海明威翻译 .....	184
第十节	赛珍珠翻译 .....	190
第十一节	奥尼尔翻译 .....	199
第十二节	斯坦倍克翻译 .....	204
第十三节	斯诺《西行漫记》翻译 .....	207

# 第一章 英国文学翻译

## 第一节 概述

英国文学翻译无疑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早在 1870 年代,上海的报刊上就连载过译述小说《谈瀛小录》和《听夕闲谈》,前者选自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的相关章节,后者选自利顿的长篇小说。之后到清末民初时期,尤其是林译小说时代,影响较大的英国文学翻译作品又陆续有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哈葛德的冒险小说、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如《吟边燕语》)以及狄更斯作品等;而拜伦、雪莱、彭斯、丁尼生等诗人也随着梁启超、苏曼殊、胡适等人的文章和译笔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彼时人们热切关注的“世界文学”中的蔚然大国,英国文学翻译越发繁荣,不过也存在着作家介绍多、作品翻译少的局面。比如莎士比亚、拜伦,虽然名字已经如雷贯耳,但作品翻译却不尽人意;还有不少作家如高尔斯华绥、萧伯纳、王尔德等,虽然翻译已比较集中,但其作品的选择则显然不够全面;还有一些作家,在“小圈子”里可能比较著名,但翻

译上远未达到一定的普及,比如曼殊斐尔等。三十年代以后,英国文学的翻译从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这一大的背景下,对英国文学史的梳理、对名家名著翻译的规模、对相关作家的研究等等,都比较繁荣。尽管在抗战爆发后有一定程度的“停滞”,但总体风貌仍然不失为“上规模、成系统”。

三四十年代中国对英国文学的译介选择,就文学史阶段而言,有着通常可见的“厚今薄古”倾向。文艺复兴之前的英国文学,虽然不少英国文学史的读本也都循例介绍,但翻译主要集中在乔叟<sup>①</sup>等极少数作家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则莎士比亚当然是最重要的作家,其他如散文家培根、“玄学派”的诗歌,仍然存在实际翻译的薄弱。十七世纪文学中弥尔顿的《失乐园》和班扬《天路历程》是最著名的。十八世纪及其后的英国文学,才是翻译的重心所在,诸如斯威夫特、笛福的小说,从“湖畔派”到拜伦、雪莱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等,都出现了不同的译本。不过,更为繁盛的还是十九世纪之后兴盛的小说作品,构成英国文学“伟大的传统”的小说家及其作品,成为三四十年代英国文学翻译中分量最重的部分。这种情形一方面与当时外国文学翻译的整体状况相一致,另一方面也同知识界对近世英国小说的判断相关。书评家常风说“自十九世纪下半世纪后英国小说渐渐有了进展,虽然它似乎还缺乏一点伟大的气魄,但已经有以超越优异于法国、俄国小说的地方。在这时期有三个重要的作家:一个是汤姆斯哈代,一个是受人冷淡,于三年前逝世的乔治摩尔,一个就是……约瑟康拉德。”<sup>②</sup>因而,一方面如狄更斯、王尔德、萧伯纳等这样的中国读者熟知的“老作家”历久弥新,被持续重译,或者从新的层面加以译介接受;另一方面,更多的原本有些生疏的“新作家”如常风提到的哈代、康拉德等,也被积极地翻译进来;同时,更大量的“半新不旧”的作家也都从文学史的评述中“显现”,与他们作品

① 乔叟的主要翻译者是方重。1943年重庆古今出版社出版了方译的乔叟叙事长诗《屈罗勒斯与克丽西德》(1946年再版时更名为《爱的摧残》),1946年上海云海出版社出版了方译《康特波雷故事》,是一个散文体节译本,收入《巴斯妇的自述》、《林边老妪》、《意大利故事》等6篇故事。

② 常风《两本翻译的康拉德小说〈黑水手〉〈不安的故事〉》,《国闻周报》第13卷17期,1936年5月4日。

的译本一同被不同程度地接受。比如简·奥斯丁、萨克雷、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高尔斯华绥等。至于更“新”的二十世纪的英国作家,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家如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三四十年代也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其中劳伦斯作品翻译较多,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二青鸟》,收入他的《二青鸟》、《爱岛屿的人》和《病了的煤矿夫》三篇小说;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初版钱歌川译《热恋》;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唐锡如译《骑马而去的妇人》,内收《女店主》、《骑马而去的妇人》等七篇小说;同年上海北新书店出版饶述一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45年重庆说文社还出版过叔夜译《在爱情中》<sup>①</sup>。以“意识流”小说称名于文坛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虽然单行本的作品翻译比较少见,但不少专业性较强的文学杂志都发表了相关的译文和评论<sup>②</sup>。

当然,也有一些在英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被程度不一地忽视乃至“遗漏”,其中原因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

- 
- ① 关于劳伦斯的相关评论有:郁达夫《读劳伦斯的小小说 Lady Chatterley's Lover》(《人间世》第14期,1934年),林语堂《谈劳伦斯》(《人间世》第19期,1935年),南星《谈劳伦斯的诗》(《文饭小品》第5期,1935年)等。徐志摩也翻译发表过劳伦斯的《性对爱》(1930年《长风》第1期)、《自传小记》(1931年《新月》三卷4期)等文。
- ② 二十年代,茅盾和徐志摩都有过对乔伊斯《尤利西斯》的评论;1929年5月,冯次行译土居光知原《詹姆斯·朱力的〈优力栖斯〉》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西洋文学》杂志1940年第2期登载有吴兴华写的书评《菲尼根的醒来》和译文《乔易士研究》(H.S.Gorman原译),评论“无论Joyce怎样为普通读者所不了解,他已成为现代精神的代表。”稍迟,1941年3月的《西洋文学》第7期又刊出“乔易士特辑”,包括乔易士像及小传,《乔易士诗选》(宋悌芬译),《一件惨事》(郭蕊译),《灰律色斯插话三节》(吴兴华译),以及《乔易士论》(张芝联译自美国批评家Edmund Wilson的论著)。关于伍尔夫的译介,1931年《妇女杂志》17卷7号“妇女与文学专号”介绍了女诗人勃朗宁夫人、勃朗特姐妹以及伍尔夫,刊登了肖像。1932年,《新月月刊》4卷1期刊载叶公超译《墙上一点痕迹》。1935年,石璞译伍尔夫的传记小说《弗拉西》(Flush)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时与潮文艺》2卷1期刊登谢庆焯《英国女小说家吴尔芙夫人》(介绍),吴景荣《吴尔芙夫人的〈岁月〉》(书评)。1943年9月《中原》1卷2期刊有冯亦代译伍尔夫论文《论现代英国小说——“材料主义”的倾向及其前途》。1945年1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谢庆焯节译《到灯塔去》,为“中英文化协会文艺丛书”一种,书前有译者序。1946年《文讯》6卷10号刊登白桦译罗曼·罗兰《渥尔夫传》,对伍尔夫的创作特色有所评论。



种相当复杂的文化选择。比如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不仅当时名气已经很大,而且作家本人1919年曾来到中国,游历了四个月时间,随后创作过一系列涉及远东、中国的作品,按理说应该格外受到中国译者和读者的关注;但是,他作品中浓重的殖民主义色彩及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其中隐现的西方文人的傲慢与偏见,恐怕都限制了对他的翻译。<sup>①</sup>

与小说相比,英国诗歌翻译的“力度”有所欠缺,但也并非乏善可陈。二十年代的英诗翻译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尤其以所谓“浪漫主义花枝”上的“三朵好花”<sup>②</sup>:拜伦、雪莱和济慈为中心,其他诗人如彭斯、威廉·布莱克等的翻译较为零星。三十年代之后,除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人及其作品的译介,从较早期的叶芝、哈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艾兹拉·庞德、T.S.艾略特、奥登等人,均有比较热烈的翻译。也许这种翻译更多是在较为专业的圈子里展开,但无疑,对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与研究都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至于散文翻译,则相对寥落。事实上,在查尔斯·兰姆(以笔名爱里亚闻)之后,英国散文领域也确乎没有更为著名的散文家了。而现代中国对以essay为代表的英国小品文的译介,也在梁遇春这位“中国的爱里亚”之后显得后继乏人。不过三四十年代的英国散文翻译还是出现了一些名家选译的选集,如四十年代范存忠与柳无忌编辑的《近代英国散文》和《现代英国散文》等。

戏剧翻译方面,除了莎士比亚之外,最著名的戏剧家就是王尔德与萧伯纳了,但他们都不能说是“纯粹”的戏剧家。三四十年代的王尔德翻译,除了戏剧作品(其实他的戏剧作品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更著名),还有

① 毛姆作品的中译本主要有:方安译《红发少年:莫恨短篇小说集》(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8月初版,同年10月再版,收入《红发少年》、《雨》、《环境的魔力》等五篇小说),林同端译《斐冷翠山庄》(重庆青年书店1944年)和王鹤仪译《怪画家》(即《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 Pence,1946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

② 见徐祖正《英国浪漫派三诗人拜伦、雪莱、莫茨》,《创造季刊》一卷4期,1923年2月。

童话和小说；而萧伯纳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轰动，更有着戏剧作品翻译之外的因素。对这两位戏剧家翻译情况的介绍，也就不再单独以文体列出。

至于英国文学研究方面，三四十年代出现的数种英国文学史方面的书籍，至今仍是比较重要的参考书籍。大致有：孙席珍译小泉八云著《英国文学研究》（现代书局 1932）、徐名骥《英吉利文学》（商务印书馆 1933）、张越瑞编译《英美文学概观》（商务印书馆 1934）、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 1937）、柳无忌、曹鸿昭译《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 1947）等。各文体文学史方面，有周其勋译美国 W.L.克劳斯特著《英国小说发展史》（南京国立编译馆 1936）、方重著《英国诗文研究集》（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9）、李儒勉译英国 John B. Priestley 著《英国小说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6）等；1940 年代末，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 Henry Reed 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小说》（全增嘏译）和 John Hayward 著《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杨绛译）。

就译本情况而言，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三十年代之后，文学翻译的观念及方法已经比较成熟，一般翻译自然是倾向足本全译。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选译、节译、译述情形的存在，而这样的译本通常又有着特定的对象。一种是面向中学生为主的少年读者，在许多书局都出版诸如“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之类丛书的情况下，这些译本不仅要选择合适的作品（多以童话、冒险故事为主），而且要选择恰当的翻译方式，因此在这些少年读本中，节译、译述的情形是大量存在的。另一种节译本则是着眼于外语学习的，通常采用中外文对照的形式。这样的译本要么直接选用短篇作品，要么对长篇作品进行节译处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丛书，其中不仅有英国、美国的英文作品，还包括部分法、俄等国作品的英文版。这套丛书于 1934 至 1936 年间出版过两集，印数甚大，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伍光建的译本。早在二十年代就以《侠隐记》的翻译闻名的这位老翻译家，三十年代依然译笔不辍，而且眼光精到，选择了不少经典名著进行翻译，并且延续了他的节译直译风格，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按照他自己的原则

对原作删繁就简；另一方面，对删节后保留的部分他采取了直译的译笔，这一点绝不同于林译时代的意译甚至改窜。茅盾是主张直译的，但他对于伍光建的这种节译直译还是颇为赞赏，并且归结出伍光建译书的三条原则：“一、他并不是所谓‘意译’的；在很多地方，他是很忠实的‘直译者’。不过他又用他的尖利的眼光判断出书中那些部分是表现人物性格的，那些部分不是的，于是当译到后者时，他往往加以缩小或节略。二、景物的描写和心理的描写，他往往加以缩小。三、和结构及人物个性无多大关系的文句，议论，乃至西洋典故，他也往往加以删削。”由此，茅盾指出，对于西洋名著，固然“需要完善的全译本直译本，以备‘文艺学徒’的研究”，但是对“一般的读者”来说，好的节译本也是绝对必须的。<sup>①</sup>据统计，收入商务印书馆“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丛书的伍光建译品，英国文学有：H.G.威尔斯《安维罗尼伽》、狄更斯《二京记》、R.L.斯蒂文森《费利沙海滩》、Lord Lytton《罗马英雄里因济》、菲尔丁《妥穆宗斯》（现通译《汤姆琼斯》）、司各特《坠楼记》、查理·金斯利《希尔和特》、萨克雷《显理埃斯曼特》（现通译《亨利·艾斯蒙德》）、高尔斯华绥《置产人》（现通译《有产者》）、斯威夫特《伽利华游记》（现通译《格列佛游记》）等<sup>②</sup>；美国文学作品有：欧·亨利《白菜与帝王》、辛克莱·刘易斯《大街》、霍桑《红字记》、华盛顿·欧文《旅客所说的故事》、库柏《末了的摩希干人》、马克·吐温《妥木琐耶尔的冒险事》（现通译《汤姆索亚历险记》）、爱伦·坡《普的短篇小说》等<sup>③</sup>。

下面对三四十年代英国文学翻译的描述，基本按照历史时期顺序，以作家为中心展开。此外，诗歌方面则还将对浪漫主义诗歌及现代主义

① 参见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原载1937年1月16日《译文》二卷5期，题为《〈真亚耳〉的两个译本》，收入《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② 这些译本并不都是新译本，有的是第二版或者第三版。此外，商务印书馆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或“万有文库”还收有伍光建译的英国文学作品如萨克雷《浮华世界》、哥尔斯密《维克斐牧师传》、狄更斯《劳苦世界》（即《艰难时世》）等。

③ 伍光建翻译的英、美作品一般收入“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第一集，第二集则收入了一些伍译法国小说，如大仲马《蒙提喀列斯突伯爵》（现通译《基督山伯爵》）、巴尔扎克《巴尔沙克的短篇小说》、伏尔泰《甘地特》、雨果《海上的劳工》等。

诗歌的翻译分别来谈。这样不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也可以比较直观地见出,三四十年代的英国文学翻译,的确存在一些选择上的“厚此薄彼”。

## 第二节 莎士比亚翻译

1934年,鲁迅连续写了与莎士比亚相关的几篇文章。其中,在《“莎士比亚”》中,鲁迅这样说:“严复提起过‘狹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sup>①</sup>。虽然这篇文章当时主要是针对杜衡等人的一些论调的,但倒也可以使我们获知一点关于莎士比亚翻译的线索。

事实上,中国学人自晚清以来就不断地提到过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从出任过清廷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到严复,到梁启超——正是梁启超将 Shakespeare 译为“莎士比亚”这一通用译名。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sup>②</sup>,也在二十世纪初年就已开始。最早译本是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出版的《滌外奇谭》,是根据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选译的文言故事;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和魏易用文言合译的这部书,译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是流传甚广的一部书。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包括一些著名的戏剧家如郭沫若、田汉、曹禺等,均是通过这个译本认识莎士比亚的,而且当时一些演剧社表演的莎士比亚剧也多以此为蓝本。1921年,田汉在《少年中国》2卷12期上发表了他由日文转译的《哈孟雷特》<sup>③</sup>,这是第一个白话的莎剧译本;此后他又译出过《柔密欧与朱丽叶》(1924年中华书局初版)。继田汉之后,莎剧的不少作品有了中译本,戴望舒、顾仲彝、彭兆良、曹未风等

①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5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可参见孟宪强著《中国莎学简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该书有“莎士比亚作品中文译本”,详尽地列出到1990年代为止的莎士比亚作品中译本情况。

③ 单行本由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11月初版,1923年11月再版,1932年3月6版,收入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

均有过莎剧的翻译。而出版界果真“‘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则是三十年代以后出现的此起彼伏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事实上，这一称得上大规模有系统的全集翻译，成为了当时文化建设中标志性的翻译活动之一。

30年代初，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属编译委员会<sup>①</sup>，以高额稿酬约定由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此为全集梁译本。30年代中期，上海世界书局委任朱生豪翻译莎氏全集，此为朱译本。1940年代还出版过“全集”曹未风译本<sup>②</sup>，但相比之下，不如梁译和朱译影响之大。我们这里主要描述梁、朱的莎氏翻译。

### 梁实秋的莎剧翻译

梁实秋<sup>③</sup>自决意以一己之力完成全集翻译后，遂制订了一个极为宏伟而长远的翻译计划，预备每年翻译出版两部，则18年后中文本莎翁全集可望出齐。这样，在教学之余，梁实秋开始译莎。至抗战前夕，共完成8部；抗战中又译完一部。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梁译莎

① 1930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年会，决议成立编译委员会，以胡适、张准为正、副委员长。经胡适推荐，第29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聘请了文江、徐志摩、陈寅恪、傅斯年、赵元任、闻一多、梁实秋、竺可桢等13人为编译委员会委员。编译委员会下分两组，一为自然科学组，一为文史组；工作则分为三部，其中一部是世界名著部，任务是“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编译委员会成立后，胡适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成立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专门委员会，由闻一多任主任，成员有徐志摩、叶公超、陈源、梁实秋，其工作为担任翻译及审查，并先行试译，以期决定体裁问题，经费暂定为5万元。徐志摩于1931年11月去世，其他人也无法专一于译事，梁实秋乃决意独立完成。

② 曹未风（1911—1963），他从1931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和十四行诗，并计划全部译出莎剧。到1944年，他译出莎剧凡11部，结集为《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

③ 梁实秋（1903—1987），曾就读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先后入科罗拉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及哥伦比亚大学。在哈佛师从白璧德修习文学批评，深受其新人文主义思想之影响。归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等处任教。此外，梁实秋在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出版的译著还有：《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思》（新月书店1928年版）、《幸福的伪善者》（东南书店1928年版）、《潘彼得》（巴蕾著，新月书店1929年版）、《织工马南传》（乔治·艾略特著，新月书店1932年版）、《约翰孙》（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西塞罗文录》（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结婚集》（重庆中华书局1940年版）、《咆哮山庄》（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等。

剧，到1939年，相继出版了《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第十二夜》等八部。梁实秋的译莎工作，基本上贯穿了他的后半生，直到1967年，他才全部译完莎剧37种，及莎士比亚诗歌三部，40本的《莎士比亚全集》于1968年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齐。

梁实秋本人的翻译思想在他当年与鲁迅关于“硬译”的论争中有较多的表达。这场著名的争论表面看是所谓“信”与“达”之争，其实出发点有着极大的不同。鲁迅为了丰富中国文法、输入新的外国表现法而更看重原文的“洋气”，希望借此改造中文的语法结构而强调“信”；而梁实秋等人则是从读者阅读立场，强调译文不能让读者“硬着头皮”读下去。<sup>①</sup>“……我私人的意思总认为译书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令人看得懂，译出来而令人看不懂，那不是白费读者的时力吗？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sup>②</sup>也就是说，力图在“信”与“达”并行不悖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他自己在译莎时也是极力做到这样。

就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而言，可能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采用何种文体来翻译。胡适等人在组织莎士比亚翻译之初，讨论最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莎士比亚的原文基本是以英国无韵体诗的形式写成，而在中文中，并没有与此相对应的文体。为此，胡适曾同闻一多、梁实秋等仔细商讨过这个问题。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胡适以其重视“试验”的“科学”态度建议：“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伯通（按：指陈源）试译散文体。试验过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sup>③</sup>

梁译本按照胡适的建议——当然也是梁本人的文字所长，选择采用了散文文体。

① 关于对这场争论的研究，也可参见王宏志《翻译与阶级斗争——论1929年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等文，收入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新月》二卷6、7号合刊。  
 ③ 胡适致梁实秋信，1931年4月19日。

梁译本的特点,可以说一是“忠实”,二是“学院气”。所谓忠实,就是与原文相比,基本上未加删削。比如在莎翁原作中,有不少语涉猥亵之处,不少译者,包括朱生豪,均将这类语言删去不少;而梁译为保持原貌,则基本照直翻译。而所谓“学院气”,更多体现在梁译本的注释之多。这些注释很多是内容方面的。比如莎士比亚剧中大量存在的双关语,是翻译中很大的难题。倘若直译,由于语言习惯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则很难传达出那种语带双关的俏皮幽默;倘若意译,则一是中文中不见得有如此恰当的对应用法,二是很容易失去了原文的意趣。梁实秋晚年曾填制过一阕《金缕曲》,颇道出了他译莎的甘苦:“看二毛生矣,指顾间,韶光似水,从何说起。隔异代,谬托知己。笔不生花空咄咄,最踌躇,含咀双关意。须捻断,茶烟里。”为了忠实于原作,梁译本采用的方法是基本照原文译出,然后以加注释的方式指出在原文中双关意义所在。此外,梁译本的注释还有很多是研究性的,即将大量国外已有的研究注释汇集其中,成为了所谓“集注本”。这些注释无疑对后人研究式的阅读有极大的帮助。

### 朱生豪的莎剧翻译

与梁实秋“新月派”著名人士、大学教授的名气相比,朱生豪像是一个无名小子;而与梁实秋的“须捻断,茶烟里”的那种有苦更有乐的翻译生活比,朱生豪的莎士比亚翻译则无疑更为困顿。然以短短八年时光译出莎剧31种之多,且译品质量之高有口皆碑的奇迹,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创造出来的。

朱生豪(1912—1944),原名朱文森,出生于嘉兴南门一个没落的小商人家庭。他的身世极为乖蹇,性情也相当孤僻,他曾自己承认是“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少年时代,朱生豪就相继失去双亲,他与两个弱弟由早孀的姑母照料。因此,在少年时代,他已经过早地体味到人生的悲哀与世态的炎凉,性格愈益沉默寡言。朱生豪中学就读于秀州中学。这是一所严格的教会中学,朱生豪在这里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在英文课上,他读了不少英文名著,当然也包括莎士比亚。其中有兰姆姐弟改写的 *Tales from Shakespeare* (莎氏乐府本事),以及原作 *Hamlet* 及

Julius Caesar 的片段<sup>①</sup>。由于学习勤奋,学业优秀,1929年朱生豪自嘉兴秀州中学毕业后,得校方推荐,升入杭州之江大学并享受奖学金。在之江大学就读期间,他选修的是中国文学系,而选英文系作为辅系,但英文系开设的全部课程,他全部选读。因国文、英文成绩超群而被誉为“之江才子”。他是“之江诗社”的成员,以古典诗词的创作得现代“一代词宗”夏承焘厚誉。同时他的新诗创作也颇有成绩。在大学期间,他深深地受到英国文学的浸润,他在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说:“由于受英国诗歌的浸润较多,自己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都是英国化的。”1933年大学毕业后,入当时上海三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就职,担任该书局的英文编辑,参与了一些英文辞典的编纂。

在有“翻译年”之称的1935年,世界书局决定组织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全集。这个翻译工作就交给了朱生豪。与世界书局签订译莎合同后,朱生豪一面以《暴风雨》的翻译试笔,一面准备一系列案头工作,包括各种译本的阅读比照、相关的研究资料等。1936年正式开始翻译。抗战期间,朱生豪与新婚的妻子宋清如定居于嘉兴老家,潜心翻译莎士比亚。在当时物质匮乏、资料奇缺的情形下,朱生豪的翻译工作极为多舛。1937年的“八·一三”和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曾两度使他的译稿毁于战火。1942年起,他避居乡间闭户译书。1944年12月26日,当他译完了36种莎剧中的31种之后,贫病辞世。直至临终,他还在用英语高声背诵莎剧。<sup>②</sup>1947年,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译作《莎士比亚戏剧集》二十七种。1954年,朱译《莎士比亚全集》三十一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计一百八十万字。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朱生豪所译的三十一个剧本进行校订,并把补译的六个历史剧和莎氏诗歌译作全部出齐。几十年间,朱译本一直是中国大陆最通行、最权威的莎士比亚译本。

与梁译本相比,朱译本显得更为灵活,也更为生动。朱生豪动笔之先,也对别家译本进行了分析,认为“……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

<sup>①</sup> 参见宋清如《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收入宋清如编《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sup>②</sup> 参见吴浩敏、朱宏达著《朱生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



